

【思想文化】

论王弼“得意忘象”方法论的革新

王 雪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魏晋时期,言意之论是源于易学革新和玄学本体论的创立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而产生的。王弼综合了儒道二家中有重求义理倾向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革新,从而得出了得意忘象、尽扫象数的方法论。王弼所提出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实现了对汉代注释经典方法的革新与超越。

关键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尽扫象数

中图分类号:B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4-0001-03

Discussion on Wang Bi's innovation to the method theory of “grasping the ideas and forgetting the emblems”

WANG Xue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Wei-Jin Dynasties, there emerges the argument concerning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originated in the need of innovation of the study on the books about changes and the founding of Neo-Taoism's ontology, furthermore, its breakthrough was in the epistemology. Wang Bi summed up two school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s traditions of seeking connotation, and deepened and innovated to it, thereby he deduced the methodologies such as “abandoning Emblems and Numbers thoroughly” and “getting meanings and forgetting Emblems”. He advanced the proposition with general meanings method theory, and realized the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cendence to the Han Dynasty of interpreting to the Classics.

Key words: Wang Bi; no words conveying meaning; thoroughly abandoning Emblems and Numbers; getting the ideas and forgetting Emblems

言意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在先秦已被重视,到了魏晋,由于理论发展的需要,这一认识论问题尤显突出。而王弼易学革新的理论依据正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象”,由此开创了诠释经典的新气象,而这一理论是深受庄子和《易传》认识论的影响。

一、言意之辨兴起的理论背景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成为当时思想界重要的争论议题之一,其兴起的缘由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

易学发展的需要。汉代经学的繁琐与僵化在当时的易学研究方面同样有所表现,两汉是象数易学充分发展的时期,但到汉末,象数易学已弊端丛生,象数家的思想局限于象数的繁琐解释之中。但象数之间的重重论证并不能揭示象外之意,这就使其逐步失去生机走向衰落,而义理派易学日渐盛行。王弼反对象数派易学的理论依据便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其次是玄学发展的理论需要,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主要是本体论问题,从汉代解释性的经验论上升到魏晋抽象思辨的本体论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方

收稿日期:2003-10-14

作者简介:王 雪(1972-),女,安徽颍上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法,言意之辨就是在这样理论需要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视。加之当时的清谈在品评人物中所关注的才性问题,已由人物的才德逐步深入到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但人物的才识风貌和性情很难用言语明确表达,而只可意会,这就引起了言意之辨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合理的解释。钟会、傅嘏辩论才性为名理学上最有名的讨论,名理学实际涉及到对言意的探讨,因此言意之辨推动了当时的人物品评。他们均引“言不尽意”作为清谈的前提,于是名理学原则遂变为玄学家首要运用的方法。如汤用彤认为名理学与玄学有极大的关系,名理学“为趋于简单抽象与合理化之途径,以求抓住最重要的原理、原则。再进一步则要求给政治人事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而玄学出焉。”^[1]王弼则是从方法论上寻求如何把握这一本体之“意”。而在易学革新中,对“象”的解释是理论上必须做出解决的,因此他将《易传》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与庄子的“得意忘言”等思想综合起来,系统地论述了言、象、意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方法,作出了哲学上的一次总结和方法论的重大突破。

一般而言,言意是关于思想的载体与其所要表达思想本质之间的关系。先秦道家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思辨,注重概念的分析与运用,对言意有其独到的认识。《老子》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超越具体事物的本体之道是不可言说的,这就包含有“言不尽意”的内容。庄子同样认为“道”是超言绝象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当名。”^[2]因此“道”之意是不可知不可言的,一般是难以把握的,这是其不可知论的思想根源。但另一方面,庄子对言意关系的论述比老子更为具体和深刻,他从认识工具和认识目的不同这一角度,以实例类比揭示了“言不尽意”的底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2]“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2]又如:“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2]这三段文字都说明了“言不尽意”,庄子的“意”指深奥玄远的本体之道,庄子用类比的方法得出言为工具、意为目的,归纳出“得意忘言”的结论。老庄对言意之间是否有一致性

的关系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易传》为缓和言意之间的矛盾,在探讨言意之时将“象”纳入了其中。由于此书是对《周易》卦辞和卦象的哲学阐释,其中卦象又是对卦辞的描绘,象的引入使言意之论更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也由此形成了象数易学。“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3]从对《周易》注解研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得出了三个观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在承认“言不尽意”的基础上提出尽意的方法是“立象以尽意”,由此,“象”成为言、意之间相通达的中介。以上儒道两家的言意之辨对王弼言意之论思想的产生有深刻地启发作用。

二、“得意忘言”与“得意忘象”的认识方法

王弼的言意之论集中体现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此篇论述了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明确言、象、意三者的功用并说明三者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易学上讲,言指卦爻辞,象指卦爻象,意是指卦爻象和卦爻辞中所蕴含的本质意义;就一般哲学含义而言,言指语言文字,象指事物的外表或现象,意指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形而上的本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先有意,然后才有显现意的象的存在,因此认识事物要依据一定的逻辑,即源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事物产生的顺序。语言文字是为说明现象而存在的,有现象才有语言文字的说明,有本质方有现象,以显其义。因此,王弼认为三者存在的时间和产生的逻辑为意——象——言这种顺序。意为形而上的超言绝象的本体,而象、言则为显示其意的工具,即“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依据语言文字可以观察到现象,依据现象就可以把握到事物的本质。“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则承认“言尽象”、“象尽意”论,认为象、意是可以认识把握的,在这点上三者具有同一性。

接着,王弼借用《庄子·外物》篇中的蹄筌之喻并从正反两面解释言、象、意的关系。“故言者所以在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3]“筌为捕鱼的工具,蹄是捕兔的工具,当捕到鱼和兔

时,筌、蹄已失去利用的价值就可置之不顾。王弼以此类比,认为言存在的目的是明象,象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得意,当象和意得到时,就可将言、象忘掉。因为言、象、意三者概念的内涵不同,言非象,象非意,它们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言的最终目的也是得意,因此言、象是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如果认识仅停留在言、象上是不可能获得对意的领悟,言与象则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功能与意义,因此三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

最后,王弼顺着庄子的思路,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认识方法。“象生于意而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后忘象者乃得意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尽”是指充分而完满的表达,“忘”是庄子的一种独特的主观修养方法,是达道的必经途径。“忘”就是从主观上排除一切干扰,做到无思无虑、万物无羁于心,通过直觉顿悟的途径达到圣人超然的精神境界,这说明王弼的“忘”是以承认言象意三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为前提,他并非否定和抛弃言象,而是认为不要将言象作为得意的充分条件,“在”表明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目的确定性,将忘象、忘言看作是得意、得象的必要条件。言、象、画都是具体可感的物事,而意、情则指向抽象玄远的精神领域。王弼的言意之辨由初始的“言尽象”、“象尽意”认识的逻辑起点到“存言非得象”、“存象非得意”的否定,进而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再次否定,终于完成了言意之辨的质的飞跃。“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宗旨在于使意经过言象而又摆脱言象,最终成为绝对的抽象存在。王弼认为抽象思维必须跳开具体现象的束缚,才能获得玄之又玄的形而上的本体,以实现从具体的言象到玄远之意的质的飞跃,但他最终还是割断了三者之间的联系。王弼试图以这种极端化的认知形式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表明其锐意革新的决心与胆识。

三、“得意忘象”的理论意义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受认识手段的种种局限,人类不可能一次性地达到对认识对象的全部把握。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认识手段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以期更全面、更深层次地探求事物的本质。而从解释学的方面来看,言意之辨实际涉及经典精神与经典文本关系的问题,认为经文并非圣人之意真实而完满的表达,由此,应弃经文而专求圣意。汉魏

学术转型期的言意之辨实际是经学与玄学之冲突在理论上的一种表现。王弼的革新思想正是通过对先秦经典的阐释表达出来的,如《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但一改汉人的名物训诂和考辨的注经方式,而是深求意蕴、直探义理。魏晋玄学将言意关系拿来讨论实有正本清源还早期儒学本来面目的意图,从而改变了汉代经学将儒学引向神秘主义的宗教意识,重新确立了与汉代经学对待经典的别样态度,其注重义理、追求玄意成为玄学家解释经典的重要目的。另外,将易学的这种廓清之功扩大到整个经学领域,则使汉代繁琐僵化的章句之学一扫而空,为最终清除易学中的象数学和经学中的章句之学起了终结作用,由此为玄学开辟了广阔而自由的发展空间。正如汤用彤所言:“吾人解易要当不滞于名言,忘言忘象体会其所蕴之义,则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而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可奠定矣。”^[4]

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方法论为玄学的解释学开创了新的认识和实践领域。忘言、忘象不但为释经的新方法而且契合于玄学追求虚无和玄远之意的学风,为进一步探求宇宙本体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和路向。而其思想渊源与《易传》,尤其与庄子的认识论有直接的关联,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庄学在玄学的形成中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庄学是以认识论为先导介入早期的玄学,王弼以“无”解老子之“道”,从而建立了“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使古代的形上思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在玄学的中晚期庄子的人生哲学却大放异彩,出现了超迈豪放且独特的魏晋风度。因此,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论是时代精神的需要在理论上的表现,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为魏晋玄学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并且对后来接引佛学及宋明理学的产生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汤用彤. 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J].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3, (3).
- [2]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3] 郑万耕, 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易学精华(上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 [4]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杨彬智]